

勞動、婚姻與台灣的新加入者： 她（他）們還是我們？

陳文蕙*

台灣人權學刊編輯委員

評論書籍

夏曉鶻等。2005。《不要叫我外籍新娘》。新北市：左岸文化。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文化。

顧玉玲。2008。《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新北市：印刻文學。

摘要

本文選取華文社會中三本關懷台灣當前社會移民議題的代表作進行評論。三本作品的作者或滋養於社會運動，或從社會學研究的角度出發，分別討論不同的移入者，包括移工、女性家庭幫傭與婚姻移民，在台灣社會的處境與地位。顧玉玲點出台灣原本就有移民歷史，但當前社會卻普遍缺乏作為移民社會的政策與多元意識；藍佩嘉指出，東南亞女性幫傭在全球化脈絡下進入台灣，卻更進一步鞏固父權與國族的界線；夏曉鶻取材自婚姻移民，指出婚姻移民在台灣被客體化的現象。三位作者都忠實地記載相關的個案與故事，點出台灣在移民政策上的不足。

本文同時也從三本移民作品的閱讀帶出作者對移民研究的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包括：全球化的脈絡下，國家疆界指涉的意涵為何？國家與社會結構是走向裂解

* 移民（尤其是婚姻移民）的學習與關懷者。近期與本文相關的學習為參與民國100年由政大政治系楊婉瑩教授所主持的研考會計畫《我國婚姻移民政策措施之影響評估與因應對策》（計畫編號：RDEC-RES-100-012）。作為一位移民議題的學習者，為這三本華文世界具代表性的著作撰寫評論，是一個學習的機會，卻也是一大挑戰，尤其筆者並沒有社會學理論的背景。在此前提下，若筆者對三本書籍的評論有任何疏漏或誤解，敬請不吝來信指正：christinachen0801@gmail.com。

還是鞏固？移民之於民主國家究竟代表對民主與福利論述的瓦解或強化？此外，筆者也在閱讀三本作品的過程中，獲得兩項知識論上的啟發，一是個人經驗與普遍知識關連性，二則是人權關懷作為實踐哲學。行動者個案故事的書寫、社會運動的參與和政策的推動，正是三本作品對移民議題的作用與意義所在。

關鍵字

婚姻移民、移工、全球化、台灣移民政策、性別與國族

台灣社會最近幾年冒出一些陌生人，毫無預警地出現在你我周遭。她／他們有些跟我們長得一樣，能用國語溝通，但口音卻很奇怪；有些看起來好像顏色深了點，一些說英文，另外一群則操著從未聽過的奇怪語言。她／他們好像人數不少，但跟我們比起來，似乎也沒那麼多。她／他們好像來無影去無蹤：工作日時除非我們特別留意，否則她／他們似乎不曾來訪。到了週末，這群人卻突然聚集起來，佔領我們所熟悉的台北車站、中山北路與台中第一廣場。這群人，不僅是陌生人，還是外來者。

而且，這群陌生的外來者還很奇特。她／他們多半比我們瘦小，但卻總是做著粗重的工作：他們出現在捷運或建築工地，頂著高溫、挑著重物，揮汗如雨；她們當中的一群，則出現在商場、市場或工廠，重複著清潔、收拾、服務與組裝的機械性勞動。另一群她們，則出現在公園或社區的中庭，抱著孩子、推著輪椅。懷裡的孩子或輪椅上的長者，似乎也習慣於她們的逆來順受－雖然多數手裡抱著與推著的孩子和長者，都和她們沒有什麼的血緣上的聯繫。如此看來，她／他們不只是外來者，而且還可能是勞動者。

至於另一群人，她們手裡抱著的，可能是自己孩子，但卻可能不是什麼合格的母親、妻子或媳婦。她們有些連國語都說不清楚，怎麼有辦法教育自己的孩子？她們有些可能好一些，會說國語，但來自敵國的她們怎麼有辦法教孩子愛台灣？她們可花了我一大筆錢，好不容易才弄進來，怎麼能不聽話往外跑？她們為了錢才嫁進來，白吃白喝，怎麼能不多給他一點家務勞動？她們不好好坐月子也不吃麻油雞，怎麼幫我們再生下一個孩子？她們是被認為沒有能力或

別有目的的，遭受「愛」剝削的無償勞動者。

外來者、勞動者，不論有償或無償。已經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常常以各種不同的名稱來標示她／他們，不論她／他們的能力，也不看她／他們的品格。我們習慣從國族、性別、社會階級、最初入境的依據來標示她／他們的身分，而衍生出一系列的名稱：泰勞、菲傭、大陸妹、阿陸仔、越南妹、外籍新娘。然而，若從這些名稱來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名稱的使用，本質上就帶有一種區分他者／我群的含意，更重要的是，這種區分還帶有一定程度的歧視意味。

戴上歧視與區分者的眼鏡，我們都傾向將這一群外來者，不論是婚姻移民或移工，看作是不請自來的外人。她／他們是從窮國來，是自願接受剝削的人，是本地勞工的競爭者，因此她／他們不值得受到保護。她／他們是血統、文化、教育程度低於我們的劣等族裔。她／他們入境別有目的，可能「假結婚，真賣淫」，而且野蠻會吃狗肉，所以是社會的隱憂。¹ 更可怕的是，她／他們在享有台灣社會許多納稅者所享有的福利與保障之餘，竟然也學起我們，集結起來佔據凱達格蘭大道大聲抗議，訴求著我們難以理解的，更多的要求。² 身為外人的她／他們，怎能如此？

我們就是她／他們：台灣的移動與勞動者

這種她／他者與我群的區分，以及這種區分的必要性和來源，正是顧玉玲

1 筆者撰寫本文期間，媒體正巧在9月1日報導一則題為〈愛犬遭兩越勞吃下肚 冰箱被警搜出後半段屍體〉的新聞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0831/96505.htm>，最後瀏覽日：2012/09/06)。報導中兩名越勞捕狗而食的行為，雖然在越南是習俗的一部分，但是在台灣的確是非法的行為，而應負法律責任（請注意本則報導中兩名越勞捕捉的是獨自外出的狗，但卻被警方以《動物保護法》以外的刑事竊盜罪移送，此舉可能也正彰顯出偵辦警察在執法上的歧視）。然而，本報導不論標題或內容，都有妖魔化越勞的傾向，而可能造成原本就已經在文化上有所差異的不同族群之間，有更大的偏見與仇視。筆者搜尋本新聞的過程中，也的確發現相關報導已經造成少數網友對外勞產生偏見性的言論。礙於筆者難以界定公眾言論與隱私權的保障界線，恕無法在此引述相關的言論。

2 2005年7月6日，來自屏東與高雄的新移民女性和她們的先生、兒女，在台灣籍朋友的陪同下，搭著夜行巴士，前往坐落在首都台北的行政院，她們要抗議的是台灣政府不顧她們的生存權利，任意提高她們取得公民身分的門檻。事實上，本案的爭議在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與《國籍法》中，對公職考試的年限規定。雖然大法官已經透過釋字618號提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相關規定並不違憲的解釋，但婚姻移民的公民權訴求，的確引發社會不小的關注。

在《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一書切入的角度。顧玉玲，這位擁有深厚文學底蘊的作家（培養於輔仁大學英文系），以其身經百戰的社會運動經驗（1990年代學運代表之一、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秘書長與理事長），選取你我熟悉的台北市中山北路為縮影，描繪出台灣作為移民國家的歷史與傳統。她將作為「台灣人」所經歷的，為人熟知的那些故事：外省人、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的移動與勞動故事，以及後來加入的外籍勞工與婚姻移民的，比較不為其他小說所著墨的那些故事，交織在一起，編織成一幅屬於同樣從各地移居至此的「我們」的毯子。

顧玉玲在本書的位置比較像是一個敘事者與報導者，而這的確也歸功於她多年支持移工團體的經驗。但是，作為一位活躍的社會運動者，要能在運動的過程中，還能保持敘事上的客觀與中立，在拿捏上並不容易。但她不僅做到了，而且還顯得游刃有餘：她不僅能以清晰的敘事，來連結讀者與故事中每一個「我」的所在場景與處境。更重要的是，在她敘述完每一個「我」的故事後，其冷靜而充滿理解的語氣，不僅正示範了妳／妳、我、她／他共同形塑「我們」的這一個中心思想，也能直指制度面上的問題核心，而建構出無比犀利的觀點。

書中有一段關於身心障礙者令狐沖，以及其雇用的看護工伊達逃跑的故事。令狐沖所申請的「合法」看護工伊達逃跑了，令狐沖不僅要負擔政府的罰款，更因為自身需求，而被迫雇用「非法」看護工。故事敘述過程中，她以冷靜的口吻，簡短的幾行文字，一針見血地點出現行台灣政策對身心障礙雇主與看護工的壓迫，以及兩者的緊張關係：

官方把看守外勞的重責大任交給個別雇主，一旦聘用的外勞逃走了，就處罰這個無能留人的雇主。於是，扣押外勞護照與居留證、強迫儲蓄形同侵佔、不讓家傭出門「以免學壞」…都在雇主與雇主之間口耳相傳。勞雇之間一開始就處在防堵逃逸的攻防兩造：雇主越緊張，外勞越不自由；外勞越受控制，雇主越易失守。如此惡性循環，勞雇雙方都成為受害者。（摘自〈沒有人是非法的〉一章，頁244。）

這是一種經過思考與實踐後，所得到的同理心。

顧玉玲筆下的每一個「我」的故事，乍看之下都有其特殊性，但是，這只是因為她擁有優越的敘事能力。令狐冲和伊達的故事，事實上正廣泛地發生在你我之間，而這也突顯出，本書所選擇乃至於撰寫的每一個故事，更大程度是要突顯其普遍性，以及移工與移民之於台灣社會的歷史長河。顧玉玲自己也在後記中說到：

這裡，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實的……大抵上都不妨礙這些人與事的真實性。現實人生是這樣生動、精采、出人意表，我簡直不願以小說、虛構的方式減低「報導」的可靠性……保留民族誌式的田野記錄。

若說是田野，我們早已在這個田野裡生存、搏鬥、協同前進多年，所有的故事都可以拉長了看，有具體的發展與過程，極少來自於訪談資料。（摘自〈後記〉，頁313。）

顧玉玲告訴我們，這座島嶼的歷史就是移動與勞動。而我們，也都是移動者與勞動者。有志一同的是，對移動者與勞動者區分「我們」與「他們」的界線與互動，也是《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一書所關懷的主題。

我與她的重新區分：女性家務移工與女性雇主的相互畫界

本書的前身是藍佩嘉於2000年取得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的論文。藍佩嘉在本書自序中，也清楚地介紹本書（研究）的撰寫軌跡：從研究、寫作、論文完成、到2006年由美國杜克大學出版英文本，再到2008年將博士論文譯寫成「不那麼學術」的中文書出版，這個研究題目陪伴了她十年。回國之後一直任教於台大社會系的她，至今也時時關懷這一群「灰姑娘」。除了上街聲援灰姑娘們的權益（例如休假權），也透過各種管道，來倡議性別／移民／勞工的權利保障議題。³

3 例如藍教授今年也在台北市女書店所舉辦的「女學沙龍系列講座」中，以「灰姑娘的南瓜馬車」為題，談論在性別與遷移脈絡下，家務勞動者的處境。

所謂的灰姑娘，書中的主人翁，就是指來自東南亞三國的女性家務移工。她們之所以被稱之為「灰姑娘」，既來自於一位菲律賓籍女性的真實經驗，也作為一種對女性家務移工的隱喻，她說：

這些家務移工的處境就好比「跨國灰姑娘」。我以「灰姑娘」的比喻來彰顯她們遷移旅程中的複雜與兩難：她們與雇主的關係在地理上親密但在地位上疏離；她們的遷移之旅既是一種解放也是一種壓迫。她們為了逃離家鄉的貧窮與壓力遠渡客鄉，但也同時為了擴展人生視野及探索現代世界而展開旅程。然而，跨越國界後，她們發現自己坐困在猶如牢籠的雇主家中。工作時，她們必須謙卑地扮演女傭的角色，只有休假時才能塗擦脂粉，掛戴珠飾，穿上短裙。（摘自〈導論〉，頁22。）

本書以台灣社會近年以來常見的社會現象：東南亞幫傭對上新富家庭為核心，探討這些女性家務移工與女性雇主彼此之間，如何在「家務勞動屬於女性責任範疇」的性別結構之中互動，並且區分「我者」與「她者」。在藍佩嘉的眼中，區分「我者」與「她者」的畫界動作，似乎是一種必然的現象，但她對傳統二元界線的劃定，顯然有著不同的意見。藍佩嘉認為，「女傭」與「女主人」的角色，可能相互流通也可能重疊出現，也因此，在性別結構的影響下，女主人的家務勞動與女傭的有薪家務工作，都是「女性的家務勞動」，而且還有越來越「女性化」的趨勢。（〈導論〉，第42頁）女傭／女主人，她者／我者，在家務的勞動既然是連續體，則兩者往往相互牽動，而且往往導致對於家務／家庭角色的重新畫界。

作者的研究結論是，在全球化的脈絡下，當本地女性雇主引入外籍女性幫傭來鞏固其「婦德」上傳統要求，這不僅強化了既有的性別結構，也使原來屬於「私領域」的「家庭」成為原本隸屬於公領域的「國族」或「階級」等界線的劃定戰場。女性家務移工作為「階級化的她者」，雖然突破了傳統地理上的國族界線，卻也重塑了無形的階級與國族界線。而這也正意味著，移工的跨國遷移現象，並不當然等於傳統界線的消失；相反地，再畫界、再階層化，都形

成更為僵化的藩籬。

撰寫至此，還沒有讀過本書的讀者，很可能誤以為藍佩嘉這本書是社會學研究的專門書籍而喪失易讀性（easy to read）。當然，倘若本書有任何學術性的色彩，當然也跟其前身為博士論文有關。然而筆者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除了宏觀性的學術論理，本書因為納入了豐富的田野調查資料，而充滿故事性。

和顧玉玲一樣，藍佩嘉也擅長描述。但不同於顧玉玲選擇忠實呈現故事全貌以引發共鳴，藍佩嘉選擇敘事與論述：她不只詮釋其田野調查過程中，與訪談者的對話，並且透過重現受訪者的語境和心理狀態，來進行雙重閱讀（double reading）式的詮釋。我們可以看到，在藍佩嘉的詮釋下，女性家務移工與女主人之間的緊張狀態，畫界作為一種標示自身角色的現象，被清楚地呈現出來。文中第六章討論女性家務移工與女主人的畫界模式與類型，就有許多精采的呈現：

今年二十九歲，剛生下一個小孩的 Emily 和公婆同住……（先簡單交代受訪者的背景、狀態，讓讀者進入受訪者生活背景）。訪談後，Emily 邀請我和她們一起用餐，當我們用餐時，女傭們留在客廳照顧大聲啼哭的小嬰兒（提供清晰的語境）……也許是當我的面，Emily 對於這樣的進食安排不太自在（對受訪者心理狀態的描述）她的婆婆相較之下似乎早就習慣家務勞工被邊緣化、隱形的地位（再進一步強化家務勞工／媳婦的共同困境）。飯後，Emily 帶著歉意以背景養成的差異及階級屬性，解釋她和她婆婆雇主風格上的差異……（摘自第六章〈屋簷下的全球化〉，頁 271-272。括弧內文字為筆者所加。）

藍佩嘉作為一位學術工作者，她透過田野資料的蒐集，來反映在台灣，東南亞籍女性家務移工與其本地雇主的緊張關係與處境。更重要的是，同時充滿人權關懷與倡議能量的她，也在本書的末章，提出她對前述現象的處方。她首先挑戰當前社會對公／私領域的二元區分。她認為，應該將照顧工作公共化。並參照丹麥、愛爾蘭、英國與美國等國家的相關政策及措施為借鏡。其次，她

認為促進家務與照顧工作的正式化與專業化，是確保家務勞動者不再只是「家庭附屬品」的方法。最後也是最根本的，台灣應該要落實對移工人權的保障。藍佩嘉尤其在整本書的最終強調，移工的處境是對某一社會公民文化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檢視指標，而這也是向來屬於移民社會的台灣，所應該促進並思考的公共議題。

我們不是外人：婚姻移民的吶喊與訴求

除了藍佩嘉筆下所關懷的女性家務移工與女性雇主，台灣社會其實還有另外一群新進者，她們多半是女性，但是處境與社會地位都顯得模糊。這群人在境外與本國人結婚，然後跟隨著她們的本地配偶一起進入台灣社會。她們也跟許多台灣女性一樣，在嫁進家庭之後，做著無償的「愛的勞動」，但聯姻的本地家庭，卻常常把她們當成買來的家奴看待。相較於女性家務移工還有機會轉換雇主（仍要強調制度對她們其實是非常不利的），但婚姻移民的地位有時比這些女傭還不如，因為她們是簽下賣身契的奴隸：不僅勞動，連身體的自主權，例如生育也被工具化地對待。

這一群人，許多人往往以外籍新娘稱呼她們，但比較合乎邏輯，或比較合理的稱呼，應該是新移民女性，或婚姻移民。而這也是這一群新移民姊妹們的吶喊。婚姻移民在台灣所構築的，帶有父權色彩與國族偏見的移民政策作用下，其市民權、政治權與社會權都不完整。⁴也因此，同樣受社會學訓練的夏曉鶻教授，就帶領著長期支持、參與和協助姊妹們的學者、團體代表和一群姊妹們，向大眾提出清晰的訴求。

對新移民女性而言，她們一切的訴求，就從正名開始，所以她們高喊「不要叫我外籍新娘」。這群長期以來透過南洋姊妹會連結的新移民女性，不僅抗議台灣社會長久以來對她們的制度性雙重歧視，更想突顯出來的，是新移民女性做為台灣的新生力軍，對台灣社會的種種期待、主張與訴求。

於是，夏曉鶻首先就讓她們自己發聲、自己創作，讓每一位新移民女性的

4 關於婚姻移民在我國的公民權地位，完整的討論可以參考楊婉瑩，研考會計畫《我國婚姻移民政策之影響評估與因應對策》（計畫編號：RDEC-RES-100-012）。

感受與訴求，化身為最真實、最直接的文字、繪畫、照片、詩與口述記錄。然後，「新移民女性」就不再只是一個沒有生命的名稱，而是生活在你我周遭，活生生的一群姊妹。夏曉鵬此一安排，不僅區隔了本書和其他討論新移民女性的書籍，還有更特別的意義：

相對於媒體和官方強勢建構新移民女性為「社會問題」，社會上鮮少聽到新移民女性的聲音，沒有聲音的新移民女性，更強化了她們無能的社會意象。（摘自〈篇一 尋找光明〉，頁40。）

然後這群從客體變成主體的新移民女性所展現出來的，確確實實是「主人」的訴求，因為她們除了訴求自身權益之外，留下的紀錄，更多的是對台灣社會的愛與認同。來自印尼的新移民女性梨雪玲就寫下從遠到近，從客人到主人的，對台灣社會的觀點：

剛來時我是外籍新娘，轉眼六、七年過去，現在的我，身分證、國籍都有了。我是未來的主人，我已經忘記我是外籍新娘了，偏偏別人還記憶猶新。台灣的文化我不是很懂，事實證明有很多人生活在這塊土地，卻不認同這個國家。每逢到了選舉期間，種族歧視、不實言論壁壘分明。我覺得大家要團結、不分彼此，一同為這塊土地生存來打拼。（摘自〈篇二 一個現在才說的故事之一 請不要叫我外籍新娘〉，頁51。）

同時，長期協助與關懷新移民女性的團體代表們，也從自身的經驗出發，提供對台灣的移民政策下，許多個案與全面性的體會與觀察。團體代表除了展現她們對新移民女性的協助歷程，讀者更容易看到的是，她們在協助新移民女性的過程中，彼此培力的心路歷程。南洋台灣姊妹會的志工吳怡佩就說：

我剛進入「識字班」的時候，年紀大概是班上最年輕的吧，有些年紀和我相仿或比較小的同學，早已嫁為人妻或是幾個孩子的媽了。我能帶給這些女性的，似乎除了中文和對這個社會的認識以外，其

他部分反而是我向她們學習的比我帶給她們的還多。在課堂上的討論與分享時，常常衝擊了我對多元文化的想像，並開闊了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觀…我希望能對這群女性多做點什麼，因為我知道在父權體制下女性受壓迫的命運是相同的，要抵抗的不會只是外籍新娘，我們的付出終究是會回饋到自己身上的。（摘自〈篇三 那段陪伴與成長的日子之四 迎風搖曳的椰子樹〉，頁 117-118。）

新移民女性究竟是台灣的社會問題還是台灣應該珍視的新血，已經在姊妹們的論述中被彰顯出來了。然而，台灣現行的移民政策與法律，並沒有用如此的觀點來看待她們。事實上，法律與政策等制度性的因素，仍然扼殺著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空間。也因此，本書的後段，就提供了長期關懷新移民女性的幾位學者專家的專論。這些學者專家從不同的面向，來檢視現行台灣關於新移民女性的制度性問題，包括法律制度作為剝奪新移民女性權利的元兇、現行政策與福利措施對新移民女性的基本權保障不足、社會缺乏多元主義發展思維、新台灣之子與新移民女性在台灣被污名等問題。幾位學者共同的聲音是，台灣的政策正在進步，但是遠跟不上扼殺新移民女性基本權的速度。

小結：幾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本文簡單地重訪三本關懷台灣的移工與移民具有代表性的華文著作。顧玉玲的《我們》以敘事的方式，帶領讀者理解移工與移民對我們和整個台灣社會的共同記憶與連結。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將關懷的視角置於女性家務移工，並且帶出女性家務移工與台灣女性雇主之間共同面對的困境既是性別的，更是階級的劃分。夏曉鶯的《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則勾勒出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生活全貌，並且藉由一系列的章節安排，突顯出新移民女性對台灣的貢獻，以及制度與社會對新移民女性的不公與污名。三位作者共同的特色是，她們都點出不同類型的移入者，在台灣的故事與處境，而且他們所遭受到的待遇，顯然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更重要的是三本書沒有直接說出口的，但當代所有國家和所有人必須思考的一個大哉問：全球化之下，不同的人（本國人、外國人、享有一個國籍、多

個國籍、沒有國籍的人、移民、勞工、女性、男性……等），其打破國家疆界的移動，究竟指涉什麼意義？是國家與社會結構的裂解還是鞏固？另一方面，這些不同的人，在聯合國揭示的《世界人權宣言》達到普世程度後，為何享有的基本權利在程度上仍不相同？移民之於民主與福利國家究竟代表什麼意義？是瓦解還是強化民主與福利的論述？

筆者當然無法在此回答這些大哉問，而好書的價值不只在寫下追尋真理的軌跡，更在帶出更多知識上的追求，三本書顯然都達到這樣的標準。比較可惜的是，本次所選讀的三本書，都是比較偏向社會學研究的著作。三本書或採取社會學的研究途徑，或滋養於社會運動，並且以田野調查和個案訪談、傳記報導等方法撰寫出來。但是我們不難想像，一個人類社會共同的大哉問，不只能從單一的研究途徑來切入。筆者更想進一步追問的是，當前人類社會關於移動與勞動者的研究，除了社會學以外，是不是還有更多的切入角度？

最後，筆者還想從三本書採取社會學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點出筆者在閱讀本書之後，關於個人經驗與普遍知識的關連性，以及人權作為實踐哲學的兩項啟示。

首先，筆者認為，個人經驗與普遍的知識之間，絕對不是沒有任何關連的。事實上，這樣的問題並不會只發生在本書作者關於移民與移工的個案調查與訪談，人類歷史上探討的各種現象，例如上一個世紀最受關注的民主化與集權政治的瓦解，也都一再地面對這種質疑。但我們在閱讀《為愛朗讀》這類作品的時候，並不會因此認定書中主角在納粹集中營的個人經驗，與其他遭受非人道對待的經驗之間，毫無任何普遍性的意涵與關連。也因此，三位作者對移工與移民女性經驗的書寫，某種程度上確實能更鮮明地引發讀者的共鳴。

其次，要在某特定議題的關懷者、倡議者與研究者三者之間畫出界線，往往是非常困難的功課。倡議者為了某種訴求，必須站在特定的立場，透過強而有力的論述來達成倡議的目的；然而議題的研究卻又要求個人站在「相對中立」的立場來點出所研究議題的矛盾。三本書的作者對此無疑做了最佳的詮釋與示範，而這或許與人權保障作為一種行動哲學的特性，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筆者想強調的，是人權與實踐之間的密切關係。更進一步來說，人權價值往往必

須透過實踐與實際的參與，方能獲得體現而取得普遍性的地位。

Laber, Marriage and Newcomers to Taiwan: They or We?

Wen-wei Chen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Taiwan Human Rights Journal*

Abstract

This book review essay analyzes three important works in Chinese language about the newcomers to Taiwan—the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marriage immigrants (mostly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Mainland China) regarding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situation in Taiwan.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the three authors emphasize the unfavorable and unequal treatment that the immigrants encountered in Taiwan by telling their stories. Koo, the social activist reminds the readers that Taiwan was for a long time in its history an immigrant society itself while Lan, the sociologist finds gender and nation-state structures are reconsolidated in the domestic area under globalization process. Finally, Shia, the sociologist points to the lack of awareness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bias which could deprive the marriage immigrants of their autonomy. All three authors reach to the same conclusion that it is urgent to upgrade Taiwan's immigrant policy and law to meet the changes of the society.

By analyzing the three books, some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study of the newcomers are raised: what effect does the migration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boundary of nation-states? Will migration consolidate or fragment the idea of democracy? In addition, this reviewer emphasizes two points inspired by the three books: the linkage of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general knowledge and taking human rights seriously in practice.

Keywords

marriage immigrants, migrant workers, globalization, migration law and policy, gender and nation-state.